

杨扬 陈引驰 傅杰 选编

二十世纪名人自述

文人自述

杭州大学出版社

文人自述

二十世纪名人自述

杨扬 陈引驰 傅杰 选编

杭州大学出版社

二十世纪名人自述

文人自述

杨扬 陈引驰 傅杰 选编

*

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

(杭州天目山路 34 号)

*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浙江印刷集团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5 印张 376 千字

1998 年 2 月第 1 版 199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01—5000

书号:ISBN 7-81035-289-X/K·052

定 价:25.00 元

选编缘起

临近世纪末,人们不约而同希望对这个行将过去的世纪作一回顾,以便为新世纪的来临,积累宝贵的经验。于是,各种回顾本世纪思想文化历程的书籍陆续出版,蔚为大观。这些书籍,对于总结过去,丰富未来的精神文化,是一件好事。作为人文学术的研究者,我们关心这种文化总结工作,也愿意作出自己的努力。

我们选编这套“20世纪名人自述”丛书,是希望通过这些在文化、学术和文艺领域取得过突出成就的文化名人的自述,了解他们各自对本世纪社会人生的看法。这些自述,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作者的治学经验、创作道路、生活经历乃至情感体验,其笔触丰富多变,或细腻入微,或奔放洒脱,展现了20世纪中国的文化人格。无论是从学术研究角度抑或扩展个人视野角度看,都将给读者一份意想不到的收获。

本丛书选取了一百二十余位名人的自述,写作年代或早或晚,经历也各各不同,选编主要着眼于他们的学术和艺术成就。同时,考虑到选编的时间跨度比较大,为了保持原作风貌,对不同的行文习惯造成的差异,仅从体例上作了少量的技术处理。

将散见于各个时期报章杂志、书籍中的名人自述收集起来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,限于各种条件,也限于我们的水平,只能选编成目前这个样子,希望将来能有更好更全的选本问世。

编者

1997年7月于上海

目 录

包天笑：	在《小说林》	1
鲁 迅：	《呐喊》自序	7
周作人：	复辟前后	12
郭沫若：	学生时代(节选)	20
陈衡哲：	我幼时求学的经过	43
叶圣陶：	略 叙	52
林语堂：	圣约翰大学	54
郁达夫：	水样的春愁	59
茅 盾：	革新《小说月报》的前后	65
徐志摩：	自 剖	84
许钦文：	稽山鉴水间	90
庐 隐：	大学时代	98
丰子恺：	我的苦学经验	108
朱自清：	我是扬州人	119
闻一多：	自 传	123
老 舍：	三年写作自述	124
苏雪林：	我写作的动机和经过	134
夏 衍：	两个口号的论争	138
冰 心：	我的童年	156
曹聚仁：	我的读书经验	165
废 名：	我怎样读《论语》	169

沈从文：	水 云(上)	172
阳翰笙：	回忆上海大学	193
聂绀弩：	自 传	214
梁实秋：	清华八年(节选)	216
巴 金：	文学生活五十年	229
朱 湘：	我的童年	240
丁 玲：	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	249
施蛰存：	《现代》杂忆	267
楼适夷：	零零碎碎的记忆	298
冯 至：	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	316
韩侍桁：	我的经历与交往	323
萧 乾：	给自己的信	346
徐懋庸：	我和鲁迅的关系的始末	364
艾 青：	我的创作生涯	382
曹 禺：	我的生活和创作道路	392
萧 红：	我之读世界语	416
何其芳：	梦中道路	418
陈荒煤：	奔向延安	423
孙 犁：	文字生涯	436
叶君健：	去国行	441
张爱玲：	私 语	462

包天笑

在《小说林》

包天笑(1876—1973),原名包天毅,江苏吴县人。通俗文学作家。主要作品有《钏影楼回忆录》等。

在报馆里编新闻,於每日的时间,很有关系。编要闻,时间最晚,因为要等北京的专电到来。那种专电,往往要到夜里十二点钟以后,甚而至于到午夜两三点钟送到,也说不定。为什么这样迟呢?原来那时的电报是分几等的,如一等电、二等电是官电,民间不许通行;三等、四等电,方是民电,又称为急电,我们所打的乃是四等电(及至民国成立以后,乃规定有新闻电,以便利报界。四等电每字一角,新闻电特别便宜,每字仅三分)。当然电报局要先发官电,继发民电,然后方发新闻电,即各报馆的专电了。

好在陈景韩那时是住在报馆里的(他的夫人故世后,其时尚未续弦),不必深夜归家,那便利得多。还有报纸全部排好,拼成版子,将要开印的时候,还要仔细看一遍,有无错误,这叫做“看大样”。大概看大样的事,属于总编辑的,也是在深夜最迟的,但罗孝高不来,两位广东先生也不管,为了怕要闻中有什么错误矛盾之处,景韩也就看看了。

本埠新闻的编辑,比较要早得多,大概到下午九点钟的时候,访稿全都来了,编本埠新闻的到十点钟就没事了。如果在九点钟以后,发生了特别事故,有重要新闻,明晨必须见报的,当然可以加

人,其余的琐闻细事,他们也就不再送稿了。至于编外埠新闻的,更要早一点。从前还没有快信、航邮,下午五点钟以后,邮差不再送信了,把当日所到的信,评定它的轻重与缓急,发清了稿子(有的须要修正一下),就没有你的事了。

刚到上海,住在旅馆里,曾孟朴就托徐念慈来访问我了,便是商量请我到“小说林编译所”去。单写小说,便不必一定要到编译所去,当时已流行了计字数酬稿费的风气了。但是他们还要我去帮助他们看稿子与改稿子,那就非去不可了。因为《小说林》登报征求来的稿子,非常之多,长篇短篇,译本创作,文言白话,种种不一,都要从头至尾,一一看过,然后决定收受,那是很费工夫的事。还有一种送来的小说,它的情节、意旨、结构、描写都很好,而文笔不佳,词不达意,那也就有删改润色的必要了。

我也告诉了他们进入时报馆的事,待时报馆的事定局了,再接受《小说林》的事。再则我那时房子也没有租定,住在旅馆里,纷乱如麻,未能决定。及至时报馆事定局了,我觉得反正上半天没有事,便接受《小说林》的事。我们规定上午九点钟至十二点钟,星期休假(报馆是星期不休假的),他们每月送我四十元,我也很为满意。我有了时报馆的八十元,再加上《小说林》的四十元,每月有一百二十元的固定收入,而我的家庭开支与个人零用,至多不过五六十元而已,不是很有余裕吗?

况且我还有写小说的额外收入呢。写小说便成为我一种副业了,起初大家不知道我在上海,后来见了时报馆上登了我的长篇连载小说,许多人才知道了。这个时候,上海的小说杂志正风起云涌,都写了信来,还有自己来造访的。狄楚青的有正书局也出了《小说时报》,本来是陈景韩编的,我去了与景韩轮流编辑,我们是不取它的编辑费,但稿费却照算的。其时还有龚子英编的《新新小说》,吴趼人编的《月月小说》,我都写有小说稿子,此外什么小说杂志记也记不清楚了。

这时上海的小说市价，普通是每千字两元为标准，这一级的小说，已不需修改的了。也有每千字一元的，甚至有每千字仅五角的，这些稿子大概要加以删改，但是许多出版家，贪便宜，杀穷鬼，粗制滥造，也是有的。更有一些穷文人，为了生活所迫，虽然他的稿子很不坏，但深入窘乡时，也不待善价而沽了。像那位笔名平江不肖生的向恺然君，他从日本回国时，写了一部《留东外史》，描写当时一般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留学的状况，到上海来，兜来兜去，这些书贾，以为其人不见经传，无人肯要，就是以每千字五角，卖给某书贾的。谁知后来销数甚佳，却赚了不少钱。

我的小说，后来涨价到每千字三元，那是商务印书馆要我在他们的教育杂志上写教育小说而加价的（按，此一笔稿费，适在商务印书馆逐年增资期中，他们请我把稿费作为股份，我亦允之，每月亦不过三四十元而已），这算是特别优待。但在时报馆（有正书局）及《小说林》两个基本地方，仍作每千字两元算。其时林琴南先生已在商务印书馆及其它出版社译写小说，商务送他每千字五元，但林先生不谙西文，必须与人合作，合作的大半是他的友朋与学生，五元之中，林先生即使取了大份，亦不过千字三元（后来商务印书馆给林先生每千字六元）。

这时候写小说，以文言为尚，尤其是译文，那个风气，可算是林琴翁开的。林翁深于《史》、《汉》，出笔高古而又风华，大家以为很好，靡然从风的学他的笔调。后来到“五四”时代，极力提倡用语体文的如鲁迅、胡适之辈，所译写的短篇小说，也是用文言的，其余的更不必说了。不过如果写章回小说，每回都有回目，纯中国旧小说的体裁的，传统下来的是用白话文了。

所以曾孟朴的《孽海花》，是用章回式旧小说体裁，而是以白话文写的。他写的同光之间的北京掌故，常常是用北京话，而在京话的对白中，却要说得漂亮，简捷俏皮，好在他是住过北京的，可以对付。不过他的《孽海花》实在写得太慢了。在《小说林》杂志上预

告,每期可以登一回(《小说林》是月刊),但他还是常常脱期,即使不脱期的话,每期登一回,试以全书八十回而言,也须六年又八个月,可谓“长线放远鹞”了。

孟朴的写小说,正与我相反,我是写了下来,不加修饰,并且不起第二回稿,以前写制艺文、叙事文,都是如此。直到如今,有好多小说,我已记不起它的内容,并且记不起它的题旨与书名了。我想:这也是我的一个恶癖与惰性,必然因此而错误很多吧?孟朴却不然,他是句斟字酌,改了又改,甚至将做好的一两回全部推翻了,从新再做起来,也是有的。可是错误还是有的,因为《孽海花》不是虚构,而是影射那时代的实事的。孟朴的著书与写小说,全在夜里工作,至少要到半夜,时常至于通晓,因为他是有烟霞癖的,他独居在《小说林》编辑所的楼上,他的家眷都不在此。

他的有烟霞癖,为了他的多病,他在《孽海花》小说上的笔名,不是叫做“东亚病夫”吗?为了这个缘故,他在上午是不起身的,有时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起身,起身以后,便与“阿芙蓉”为伴。

我每天到《小说林》去是在上午,那个时候,他正是“春眠不觉晓”,在他的黑甜乡里,不便去惊动他。要去访他,最好是在吃过夜饭后,而他也是精神最健旺,即使和你谈一个通宵,也不算一回事。

在《小说林》的时候,我们还有一个志愿,可惜到后来,这个志愿,一个都没有偿。因为孟朴说:他的《孽海花》,写到庚子拳变,两宫回銮以后,就结束不写了,赛金花让她活下去吧,也就无关紧要了。因此徐念慈(《小说林》总编辑)说:“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,记东三省红胡子的事。”在清代称红胡子为胡匪,又称为马贼,民间则有称为义勇军的,这时候正在崛起时代,他也起好了一个书名,正在搜集材料。他说:“这部小说,正好接在《孽海花》之后,可以出版。”

我说:“我想写革命事迹。”当时革命党东起西应,排满风潮热烈。恰有徐锡麟、秋瑾的一件事发生,秋瑾是中国女子中革命的第

一人，我想把秋瑾做书中的主人，而贯穿以各处革命的事迹。书名也已拟好了，叫做《碧血幕》，并且在《小说林》杂志上登载过一两回的，后来《小说林》杂志不出版了，我也就此搁笔了。

孟朴的《孽海花》始终没有完篇，最初出了有二十回的单行本，倒也风行一时。但是这单行本出版以后，虽然书中人物出于影射，然而核对事迹，一望而知。因此得罪了许多老前辈，第一，他的老岳丈汪柳门，便不以为然，更有许多还是他的父执，尤其苏州人中，如陆凤石、汪芝房、叶鞠裳等，对于他都有谴责之词。后来端午桥邀了他去，说何必写这种小说得罪人呢？你何妨到我这里来呢？（旧回目中，本亦有涉及端方的事）这时他们又搞什么“宏文”馆，编什么《博物大辞典》，那时我已不在《小说林》了。总之资本已经蚀光，关门大吉。

这以后，孟朴便浮沉于宦海中。辛亥以后，陈陶遗任江苏省长时，他是什么水利局长、财政厅长，闹了一下子，我也弄不清楚，其实史事非其所习，他是一个文学家呢。

到1927年，他官又不做了，他的大公子曾虚白，从法国留学回来，在上海开了一家“真美善书店”（我们称之为父子书店），又出了《真美善》杂志，《孽海花》又写了十余回，写到赛金花那时从洪宅出走为止，那一个回目は《青阳港·好鸟离笼》，以后便不曾写下去了。

徐念慈的红胡子小说，可怜他并不曾着笔，便这样赍志以没了。我的《碧血幕》，也不曾继续写下去，后来便是辛亥革命，仅仅秋瑾一方面的事，也不足以包罗许多史实。但我对于这个志愿，当时总搁在心头，老想以一个与政治无关的人，为书中的主角，以贯通史实，这不但写革命以前的事，更可以写革命以后的事了，只是我却想不起我的书中主人。

直到民国七八年间，我在北京，和张岱杉先生（名弧，别号超观，绍兴人，曾一度为财政部长，是前清举人）谈起此事，他知道我要写此历史小说，他提醒我道：“眼前有一个极适当的人，你没有留

意吗？”我问是谁？他说：“梅兰芳将来是一个成名的人，而且都搭得上政治历史的，何不把他为书中主角呢？”我被他提醒了，大为称善，于是我便写了《留芳记》，但也只写了二十回，给林琴南先生看过，他还给我写了一篇序文，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。关于写《留芳记》的事，我后将再述。

在从前以一个文人，办点商业性质的事，终究是失败的多数。《小说林》也是如此，虽然所出的书，倒也不少，销路也不差，还是亏本。譬如说：放出的帐，收不回来；管理处不得其法等等；而且出版物是有时间性，尤其是小说。他们是自办印刷所、排字房的，后来搜出了半房间的铅字，都是拆了版子，不归原位，倾弃在那里，只好作为废铅卖了。诸如此类，都是吃了人家的亏。时报后来的失败也是如此，他们两位，狄楚青与曾孟朴，都是公子哥儿呀！

鲁 迅

《呐喊》自序

鲁迅(1881—1936),原名周树人,浙江绍兴人。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、思想家。1917年在《新青年》发表现代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自此确定了他在现代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。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,后来大半忘却了,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,虽说可以使人欢欣,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,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,又有什么意味呢,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,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,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,曾经常常,——几乎是每天,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,年纪可是忘却了,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,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,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,在侮蔑里接了钱,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回家之后,又须忙别的事了,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,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:冬天的芦根,经霜三年的甘蔗,蟋蟀要原对的,结子的平地木,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,我以为在这途路中,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;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,仿佛是想走异路,逃异地,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我的母亲没有法,办了八元的川资,

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 N 去进了 K 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卒业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

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：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，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许多

年,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。客中少有人来,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,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,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夏夜,蚊子多了,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,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,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,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,脱下长衫,对面坐下了,因为怕狗,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?”有一夜,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,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,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?”

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,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

我懂得他的意思了,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,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,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,我想,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,但是说:
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,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,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,不久都要闷死了,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,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,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,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,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?”
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,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是的,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,然而说到希望,却是不能抹杀的,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,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,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,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,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从此以后,便一发而不可收,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,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,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,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,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,所以有时

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顾及的；但既然是呐喊，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，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说来，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，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，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，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，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，便称之为《呐喊》。

1922 年 12 月 3 日，鲁迅记于北京